

目 录

| | |
|---------|----------|
| 序言..... | 孙有中 /iii |
| 前言..... | 杨鲁新 /vi |

第一部分 教材政策研究

| | |
|------------------------|-----------------|
| 1 外语教材政策研究述评..... | 李 明 徐泽琨 陆茜茜 /3 |
| 2 我国基础外语教材政策历史与经验..... | 李 明 杨鲁新 /14 |
| 3 外语教材政策国际比较研究..... | 张琳涛 彭玉清 王江涛 /36 |
| 4 教材政策落实现状个案研究..... | 李东玉 全 馨 /58 |

第二部分 教材内容研究

| | |
|--|-----------------|
| 5 我国基础英语教材内容研究述评（2001—2023）：现状与展望 | 李东玉 彭玉清 张逸帆 /79 |
| 6 初中英语“文化意识培养”教材内容研究：文本分析视角 | 李东玉 彭玉清 /94 |
| 7 高中英语教材读写板块的思维品质培养：基于国内三套教材的文本分析 | 李东玉 魏滢欢 /112 |

第三部分 教材使用研究

| | |
|------------------------|------------------|
| 8 我国中小学英语教材使用研究综述..... | 杨鲁新 常 畅 全 馨 /131 |
| 9 中学英语教师教材使用取向研究..... | 杨鲁新 常 畅 /148 |

- 10 英语教科书的多维透视：基于同课异构的案例分析
..... 李 琛 杨鲁新 /169
- 11 中学英语教师教材使用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的个案研究
..... 张琳涛 徐泽琨 /190

序 言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迫切任务。而人才培养的质量取决于两大根本支撑，其一是教师，其二就是教材。教材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为教学提供知识内容与教学方法，而且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即为谁培养人这一问题。在此意义上，教材成为国家事权。目前，我国教育界普遍认识到，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的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

外语教材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外语（英语）是唯一贯穿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全过程的科目，又是直接输入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科目，教学内容承载着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学生时间最长、人数最多。在高等教育阶段，外语不仅是人人必修的公共课程，而且成为最大的专业类课程之一。不仅如此，外语（专业）教学较之其他科目（专业）的教学，更多地依靠教材所提供的学习材料。就教材的种类和出版的数量而言，外语教材无疑名列前茅。因此，外语教材的建设和研究应受到特别重视。

当前，加强外语教材研究应着眼于两个基本目标。一是把握方向，即保障外语教材正确的价值导向，服务于立德树人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教育方针。二是提高质量，即根据外语教育的基本规律，结合我国外语教育实践的实践经验，揭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与方法，打造融通中外的外语精品教材。

随着全国首届教材工作会议的召开，外语教材建设和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和外语教育的提质升级对外语教材建设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在外语教材编写中，如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如何扎根中国大地，站稳中国立场？如何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如何引导学生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外语教材编写如何吸收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教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如何提炼和继承中国外语教育教学的宝贵经验并开拓创新？如何借鉴国际外语教材编写的先进理念与方法？在全面贯彻落实《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时代背景下，外语教材如何支持和引领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乃至慕课建设？一句话，外语教材如何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国际化人才提供坚实支撑？所有这些紧迫问题，都需要中国外语教材研究者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做出回答。

在此背景下，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国家大中小学外语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积极促进外语教材研究成果的产出与传播。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策划了“外语教材研究丛书”。本套丛书一方面积极引进国外外语教材研究经典著作，一方面大力推出我国学者的原创性外语教材研究成果。我们精选引进了一批国外外语教材研究力作，包括：

—《外语教材中的文化呈现》(*Representations of the World in Language Textbooks*)

—《英语教材研发：创新设计》(*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s in ELT Materials Development: Looking Beyond the Current Design*)

—《英语教材研究：内容、使用与出版》(*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extbooks: Content, Consumption, Production*)

—《英语教材研究：国际视角》(*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aterials in ELT*)

—《英语教材与教师角色：理论与实践》(*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Roles of EFL/ESL Teachers: Practice and Theory*)

—《英语的建构：国际英语教材的文化、使用与推广》(*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Culture, Consumerism and Promotion in the ELT Global Coursebook*)

—《语言教学材料的真实性设计》(*Designing Authenticity into Language Learning Materials*)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引进的目的在于批判性地借鉴和自主创新。同时我们也推出国内学者外语教材研究的优秀成果，首批包括：

- 《新形态外语教材研究》
- 《中国基础外语教材研究》
- 《中小学英语教材史研究》

本套丛书为开放性丛书，后续将不断更新。期待本套丛书为中国外语教材研究提供理论启迪和实践指导，最终为中国特色外语教材的编写、使用、研究做出贡献。

孙有中

2023年10月30日于北外

前 言

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前提。习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的重要性，教材建设需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教材作为国家事权，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知识和方法的传递，同时更是人才培养价值取向的体现。国家教材委员会2020年1月7日印发的《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指出，到2022年，中小学教材建设重点是增强教材育人功能，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各学段教材的系统性。与此同时，外语教育是培养学生具备国际视野、具有全球胜任力的重要途径，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基础教育外语教材的理论梳理与实践探索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外对于外语教材的研究已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教材研究的范围涉及教材编写与设计、教材开发与出版、教材使用与评估等，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外语教材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我国教育界十分重视外语教材的建设与研究，研究主题涉及教材研究发展、教材编写、教材研究状况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大部分研究成果仍聚焦于理论讨论的层面，缺乏学理分析与实证支持，对教材的分析仍然是零散的、无系统的。另一方面，基础外语教材作为外语教学活动的重要抓手，对青少年语言知识习得和核心素养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对青少年文化自信和文化意识的培养更是至关重要，而目前的研究仍主要聚焦于大学英语教材。

在此背景下，本书围绕教材政策、教材文本和教材使用三个主要研究领域，系统地梳理国内外基础教育相关外语教材政策文本及其演变历程，进一步开展教材内容分析以及教材使用实践探索，为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材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启示。具体而言，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教材政策研究、教材内容研究和教材使用研究。在每个部分，编者首先对领域内相关

文献与研究展开详细的梳理与述评，并基于述评内容，在之后的章节展开具体话题的分析与讨论。

本书的第一部分“教材政策研究”涵盖了对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的梳理、政策历史与经验的分析、外语教材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以及针对教材政策落实情况的探究。通过梳理与分析我国外语教材政策文献，以及比较其他国家外语教材的编写、审查和选用等政策，尝试探索基础教育外语教材建设的中国模式，完善外语教材建设的学术体系。在本部分最后，编者通过对教材政策落实现状的案例式探究，深入剖析教材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遇到的困难及相关影响因素，为更好地落实教材政策提供思路 and 参考。

本书的第二部分“教材内容研究”针对基础教育外语教材内容展开系统梳理，并以不同出版社的英语教材为例，以《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为依据，分析教材在课程思政、学生文化意识培养和思维品质培养等方面的路径、作用与影响。文本作为教材呈现的最基本内容，直接决定教材质量，对教材文本的研究历来受到学界重视。第五篇论文尝试从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等四个方面针对基础教育教材内容研究展开系统阐述，剖析现有成果和前沿热点，尝试厘清国内外外语教材文本分析的研究现状。第六、七篇论文分别从初中和高中英语教材入手，考察不同版本教材的教材内容在学生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培养两个方面的呈现情况。

本书的第三部分“教材使用研究”针对英语教材的使用状况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考察，并借助案例研究，探究不同情况下的英语教师教材使用情况。英语教学的发展历程，也是英语教材研究的发展历程，教材价值的发挥离不开教材的使用过程。第八篇论文对英语教材使用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归纳国内英语教材使用研究在论文发表类别、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等方面的特征，尝试探讨国内英语教材使用研究的问题与挑战，为我国外语教材体系建设和教学发展改革提供启示。第九篇论文通过质性案例研究法，探究两位中学英语教师的教材使用取向，考察影响不同教师教材使用取向的因素，为我国外语教育研究者和一线教师提供实践参考。第十、十一篇论文分别基于不同研究情境，以案例研究为途径，探究中学英语教师在同课异构和民办学校等不同教学情境下的教材使用层级转化过程，探讨教师在教学活动不同环节的教科书应用情况、教材使用策略及影响因素。

本书的内容与成果基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重大课题“全球外语教材研究与资源建设：多维视角下的大中小学外语教材研究”（课题编号：2022SYLZD014）和2021年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专项课题“外语教材政策落实研究”，并借鉴了来自教材研究工作坊受邀教材研究专家的意见。参与本书写作的课题组相关人员主要包括青年教师李明、李东玉、李琛等博士，博士研究生张琳涛、常畅、徐泽琨等同学及硕士研究生全馨、彭玉清、魏滢欢、张逸帆等同学。在此，作为主编，十分感谢课题组成员的深度参与，感谢参加教材研究工作坊专家们所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以及参研教师的合作与付出，也要特别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莫大的支持与帮助。

总之，本书以英语教材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教材政策落实分析、教材内容比较与分析、教材使用的案例式探究等方式，探讨基础教育外语教材研究现状，为中国基础教育外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探讨与实证基础。我衷心希望本书能够激发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教材和外语教学研究。本书难免出现疏漏或有待商榷之处，恳请各方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杨鲁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3年10月7日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stack of books. The top book is fanned out, showing its pages. The stack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frame, with the fanned book extending towards the right. A dark horizontal band is overlaid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containing the title text.

第一部分 教材政策研究

1 外语教材政策研究述评

李 明^a 徐泽琨^b 陆茜茜^c

^{a, b}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c江苏省东海中等专业学校

提 要：外语教材政策已经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以及实现国家核心利益的软实力，对外语教育实践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成为各主权国家推进外语教育战略的重要抓手。为系统梳理国内外基础外语教材政策的研究现状，本文以基础外语教育政策为基点，在对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进行述评的前提下，对基础外语教材政策研究进行深入阐述，并指出其对我国基础外语教材建设和研究的重要启示。研究表明，我国的基础外语教材政策研究多散见于外语教育政策史料或年度报告中，以经验性历史回顾为主，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国外的基础外语教材政策研究则更多基于基础教育教材的编写、审定和选用政策，鲜有针对基础外语教材政策的专门性研究。外语教材尤其是基础外语教材政策研究依然存在较大的开拓空间。我国未来的外语教材政策研究亟须借鉴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教材政策经验，探索出适应中国国情的外语教材建设模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研究学术体系，增强我国在教材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关键词：基础外语教材；教材政策；述评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推进，外语在人类社会平等对话和沟通过程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在此背景下，外语教育政策关乎国家事权，已经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以及实现国家核心利益的软实力。近年来，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逐渐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外语教育政策从出台到实施涉及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解读、推广、师资培养、资源整合等诸多议题，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外语教育政策对外语教育实践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外语教材政策作为外语教育政策的重要维度，成为各主权国家推进外语教育战略的重要抓手。

1 我国基础外语教材政策研究述评

1.1 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一、起步时期(1993—2004年),该时期的研究内容与外语教育政策间接相关,尚缺乏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二、发展时期(2005—2007年),该时期学界开始了解到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价值,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三、加速发展时期(2008年以后),该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代表性成果(郝成森 2013)。通过对既有研究的系统梳理,笔者发现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包含以下不同维度的议题:以研究视角来看,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外语教育政策与国家安全研究等宏观研究,外语考试政策、外语课程政策、外语教师教育政策、外语教材政策等微观研究(赵耀 2022);以研究内容来看,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外语教育政策的历史、价值和对策等研究;以研究范式来看,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外语教育政策的思辨研究、实证研究;以研究涉及的教育阶段来看,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基础外语教育、高等外语教育、职业外语教育、社会外语教育等阶段的政策。其中,大部分研究往往采用历时研究方法,聚焦于不同时期或某一具体时期外语教育政策的演进和发展,梳理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问题,以期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指明方向,提出建议。例如,谢倩(2009)探讨了我国21世纪中长期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设想和思路;李瑞(2015)梳理了清末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张治国(2018)以语言习得规划理论为概念框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2008),阐明和分析新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还有部分研究关注外语教育政策与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关系。例如,李娅玲(2012)和张治国(2018)分别对我国不同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进行梳理,揭示了外语教育政策与宏观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王定华(2018)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将之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外语教育政策、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中国外语教育政策以及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张天伟(2021)在梳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主要发展阶段、特点和成就的基础上,就外语教育政策制定中的治理体系、战略规划、区域发展、信息化建设、新文科建设等方面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张治国(2022)依据相关外语教育政策理论,梳理了语种规划的定义、属性、分

类和选择标准,并将与我国建交国家的语言划分为八个等级,为国家层面和高校层面的语种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语种参考。此外,也有部分研究借助不同的理论视角或方法开展文献综述研究和理论探索研究。例如,沈骑(2011)将语言政策和外语教育整合在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考察,从教育政策研究的过程、内容和价值三个维度探讨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框架。贾连庆(2020)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又称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采用共同分析的可视化研究方法,梳理出外语教育政策理论及实践、全球化视角下外语教育、外语教育与国家安全、国别外语教育政策比较等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热点。张蔚磊(2022)在回顾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教育政策的研究框架、教育政策信息流理论、教育政策评估理论和语言政策规划理论,构建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总体模型及其子模型。现有研究表明,我国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自2008年以来愈发受到关注。其中的热点议题包括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历史梳理、外语教育政策和其他社会宏观因素的关系、外语教育政策的具体制定,以及外语教育政策与其他研究领域之间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仍大多关注宏观层面,少有研究关注教育政策的具体落实,如政策如何对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课堂中各要素的互动施加影响。从研究方法来看,也主要以思辨研究为主,较少采用实证研究的范式。

在我国,外语教育起始于人形成初级素养的基础性阶段,主要在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开展。基础教育是国家教育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通常作为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外国语言科目。基础外语教育具有基础性、普及性和未来性特征。外语政策对外语教育实践发挥着重要乃至决定性作用。因此,基础外语教育阶段的政策研究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例如,樊莲生(2015)对中学俄语教育政策与规划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和建议。张平(2017)将海峡两岸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政策进行比较,并对大陆地区如何提高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育水平提出建议。赵耀(2019)通过归纳和评价国内外研究中国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的成果,认为中国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主要侧重以下方面。第一,外语教育政策的历史性研究。这类研究涉及外语教育发展研究、外语课程政策研究和外语教材建设研究,研究视角和理论更接近语言教育学的历史研究,缺乏对我国外语教育面貌和政策发展的全面总结与深刻反思。第二,外语教育政策的实证性研究。此类研究多以外语使用情况调查、外语教学与测试的具体研究等问题为导向,探讨对待外语的

态度、外语教师信念等“隐性”层面的语言政策，缺乏对其他场域的外语政策及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第三，外语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此类研究多为外语教育政策的个案比较、历时比较和跨国（境）比较，文献资料扎实，但微观分析不足，且多缺乏实证调查的一手数据。第四，外语考试政策的社会属性研究。此类研究与传统的语言测试项目分析研究有了明显区分，对外语教育及考试的政策制定更有参考意义。第五，外语教育政策的思辨研究。这类研究广泛吸收人类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突破了以往语言学、教育学等单一学科的知识背景，弥补了以往相关研究缺乏战略性、全局性、可持续性的短板。但目前此类研究重复性操作的作品较多，对外语教育发展和政策议程的宏观把握、深入评价和科学预判的成果并不多见。我国基础外语教育政策呈现出以下特点：从开设语种来看，我国基础外语教育语种格局经历了从“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转变；从政策制定过程来看，我国基础外语教育规划的参与主体多而复杂，政策的延续性和科学性有待提升；从学术成果来看，我国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王斐（2020）则通过对比世界各国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的实施，发现西方国家在教育信息统计、政策目的解读、师资培养聘任、政策推广、学习资源开发及语言测试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如明确外语教师选拔标准、多部门合作为教师提供培训机会、改进现行聘任制度、为教师的职后发展和职业生涯提供保障等，对我国具有重要启示。以上研究表明，我国学者不仅关注我国的基础外语教育政策，还较为关注我国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的对比研究。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具有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具体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必须考虑本国的现实情境。

1.2 基础外语教材政策研究

教材是教师教学的主要依据，也是反映教育政策的主要载体，直接关系到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教材是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的重要载体，也是深化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外语教材由于贯通全学段，覆盖多语种，涉及学生人数多，对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外语教材又具有特殊性，处于意识形态和人文交流的前沿阵地，肩负培养具有家国情怀、人文关怀、世界胸怀的国际化人才的时代重任。因此，学界较为关注外语教材建设研究。例如，毛小红（2014）以1861—1976年德语的教材建

设情况反向推测了当时的德语授课内容与教学法；刘道义等（2011）分析了中小学英语教材体现的语言教育观、课程政策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并探讨了教材建设对课程政策发展的启示。相较而言，基础外语教材政策研究则多散见于外语教育政策史料或年度报告中，以经验性历史回顾为主。在基础教育领域，新一轮课程改革对外语教材编写的思想性、时代性与科学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自2011年起持续推出“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系列蓝皮书，专设“基础外语教育”章节，按年度记载我国基础外语教育的事件、活动和发展情况，其中涉及小学、初中、高中英语，中小学日语、俄语教材建设和教材政策的相关内容。唐洁仪、何安平（2018）结合将学科核心素养纳入普通高中课程的顶层设计理念，尝试探讨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落地在教材领域的突破口。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教材工作的重要精神，及时总结我国外语教材发展成就，充分展现我国外语教材建设的新趋势与新变化，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先后发布了《2020年中国外语教材发展报告》《2021年中国外语教材发展报告》和《2022年中国外语教材发展报告》。报告专设“中小学外语教材建设”章节，对我国中小学外语教材相关政策，以及义务教育英语、高中英语、中学多语言教材建设情况进行阶段性总结梳理，对基础外语教材建设的趋势、问题与举措进行反思。总体而言，我国的基础外语教材政策研究多基于宏观视角，强调教材建设要与党的教育方针紧密结合，体现出教材政策与宏观政策的高度相关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从微观视角多角度考察我国的基础外语教材政策。

2 国外基础外语教材政策研究述评

2.1 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

外语作为国际间语言文化交流的主要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体现各国的主流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取向，同时也反映出不同语言在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版图中的历史演变、空间分布及社会影响力。因此，比较分析发达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谢倩（2011）基于国家发展的宏观视角，阐述了欧洲近现代历史和多样化的社会语言现实，比较分析了欧洲学校外语教育低龄化和语种多样化的特点；通过对美国学校外语教育发展历史和现状的对比，以及联邦政府外语教育政策立法演变的比较分

析, 阐明了美国国家语言政策从强调英语中心主义的单边政策到重视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的变化; 通过对澳大利亚学校外语教育发展史的梳理, 阐明了澳大利亚学校外语教育政策从面向精英群体到面向全体学生的重大转变。张贞爱(2011)以韩国七次教育改革为轴线, 对其外语教育政策的制约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多维分析及评述, 旨在促进我们对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及其政策落实运作规律的认识。李立(2019)建构外语教育政策的理论分析框架, 围绕外语教育政策的过程、内容和价值, 对中国、美国、欧盟的外语教育政策进行对比分析。其中, 欧盟和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欧洲致力于建设内部一体化进程并积极推动和维护欧洲多语制, 采取系列措施促进外语教育在欧洲的发展。例如, 20世纪70年代, 欧洲理事会出台《欧洲语言学习基本标准》(又称《语言力量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欧盟先后推出“伊拉斯谟计划”“苏格拉底计划”和“达·芬奇计划”; 2001年以来, 欧盟出台并修订《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学习、教学、评估》(*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不仅对欧盟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制定类似的语言教育政策和标准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而且对全球的语言教育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则几乎都与美国国家安全有着密切联系。例如, 为了适应美国在21世纪的国际经济与安全竞争的需要, 美国政府于1996年发布了面向全美所有K-12学生的外语教育标准——《外语学习标准: 为21世纪做准备》(*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s Learning: 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提出了外语学习的五大核心标准, 并分别在1999年和2006年对该标准进行修订; “9·11”事件后的10年间, 美国政府出台大量外语教育政策性文件, 提出了重点建设保障美国国家安全需要的“关键语种”概念。上述发达国家的基础外语教育政策体现了前瞻性(如外语教育的低龄化和语种的多样化政策), 并具有一定的借鉴性。然而, 各个国家的基础外语教育政策受其所处的特殊宏观环境(如欧盟的一体化以及美国所需应对的21世纪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影响。我国的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研制应充分考量环境的适应性, 在理性借鉴的基础上不断寻求政策创新。

2.2 基础外语教材政策研究

在大多数情况下, 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受到其国家认同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Pavlenko 2003), 旨在了解和研究外国, 服务于美国国家战

略(肖华锋 2022)。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的具体规划权常常被下放至州政府乃至各学区,联邦政府仅提供宏观的行政框架。鉴于种种现实及现行政策,美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教材政策往往被置于宏观的教材政策下进行讨论。美国基础教育阶段教材的编写、审定和选用政策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首先,教材的编写者们需要对教科书的内容来源进行严格筛查,选取那些“有利于进行思想控制和社会控制而不会产生羁绊的知识”。其次,教材内容的呈现与否表达的是教材编写者们对于相关社会团体和某些社会现象所赋予的隐含政治价值。最后,美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最后呈现的内容是“美国社会多方权利主体与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取向与权力分配的综合较量的结果”。第二,具有市场化特征。在教材编写、审定和选用的过程中,多方势力会相互角逐,在整个政策施行的过程中达到一种权力的动态平衡。作为市场主体的教材出版社需要满足政府的宏观政策,厘清各方利益实体的需求,最终做出最能迎合市场且能够使自己获利最大化的选择。第三,能够反映公众的多元诉求。在选取州内教材的过程中,市民团体、相关利益团体、教育专家等多方主体都能够参加。而这些团体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各领域或层面社会公众的教育心声。与美国不同的是,印度所采取的教材制度为“国定制”,即国家规定教育系统中教材的选取。印度的教材制度受其源远流长的历史的影响,且主要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印度文化中把背诵和记忆当作一种成就的传统,中央集权式的考试制度,印度教师地位普遍低下且缺乏自主性,以及某些集团所施加的影响。与印度一成不变的教材制度所不同的是,日本的教材制度从明治维新开始就一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经历了选用制、认可制、国定制、审定制等一系列制度(刘欣 2007)。通过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教材政策和制度,不难发现,教材制度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并且主要服务于其所处社会的社会制度。每个国家教材制度的演进都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进程。

3 国内外基础外语教材政策研究启示

3.1 探索外语教材建设的中国模式

外语教材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多个相关利益主体。在我国,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主导教材建设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组织国家指导性、示范性教材建设的过程中,引导引进国外先进教材的工作并

加大其力度, 加快国外先进教材内容的消化、吸收工作进程,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平先进的教材体系。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 我国还应注重有效发挥和调动出版社在教材建设方面的积极性, 逐步建立和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在教材建设中的作用, 形成全国性的教材评介和推荐机制, 繁荣教材市场, 满足教学需要, 保证教学质量。外语教材政策是国家政策的组成部分, 必然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制约。外语教材政策具有历史性, 随着社会发展、教育自身发展而不断地动态发展着。世界各国虽然国情不同, 但好的经验应该互相借鉴, 以不断完善自己的使用制度。为了提高我国外语教材的编写和出版质量, 推进我国基础外语教育课程改革, 我们有必要借鉴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教材政策经验, 探索出适应中国国情的外语教材建设模式。

3.2 完善外语教材研究的学术体系

根据既有研究,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依然存在较大开拓空间。在研究数量上, 相关研究成果依然不足, 这说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研究层次上, 相关研究成果感性经验有余, 系统论证不足; 描述介绍有余, 深入探讨不足; 反思批判有余, 理论建构不足。这说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在制定上存在盲目性和急功近利的现象, 对外语教育规划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负面影响(束定芳、华维芬 2007)。这与我国缺乏对重大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不无关系。因此, 如何从理论高度建构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体系, 应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外语教材政策研究是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方面, 需要顶层设计与协调发展(王文斌、柳鑫淼 2021)。我们应充分发挥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的研究、指导、咨询、服务与传播功能, 加强专业队伍建设、专项课题研究、数据资源建设, 围绕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和外语教学发展实际需要, 组织协同攻关研究, 形成教材理论探索与教学实践创新紧密结合的新格局(曾天山等 2021); 通过对我国外语教材建设中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的针对性研究、创新性探索与系统性构建,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研究学术体系, 以增强我国在教材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参考文献

- ACTFL. 1996.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http://eall.hawaii.edu/yao/2006workshops/HKWorkshop/HKworkshopWeb/5Cs.pdf> (accessed 11/07/2023).
- Council of Europe. 2020.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https://rm.coe.int/common-european-framework-of-reference-for-languages-learning-teaching/16809ea0d4> (accessed 11/07/2023).
- Pavlenko, A. 2003. "Language of the enem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6 (5): 313-331.
- 樊莲生, 2015, 我国中学俄语教育规划与政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 郝成淼, 2013,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概况与前瞻——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1993—2012), 《现代大学教育》(1): 57—64。
- 贾连庆, 2020,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73—78。
- 李立, 2019, 中美欧外语教育政策比较研究, 《南昌师范学院学报》(4): 38—41。
- 李娅玲, 2012, 《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道义、龚亚夫、张献臣, 2011, 我国中小学英语教材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课程·教材·教法》(1): 69—75。
- 刘欣, 2007, 美国、印度、日本教科书制度发展史及其启示, 《宜春学院学报》(3): 120—124。
- 毛小红, 2014, 中国德语文教育历史研究(1861—1976)。博士学位论文。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 沈骑, 2011,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框架建构, 《外国语》(1): 70—77。
- 束定芳、华维芬, 2009, 中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六十年: 回顾与展望, 《外语教学》(6): 37—44。
- 唐洁仪、何安平, 2018, 新一轮教材修订的突破口。载王文斌、杨鲁新、徐浩(主编), 《2017中国基础外语教育年度报告》。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49—54。

- 王定华, 2018,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回眸, 《课程·教材·教法》38(12): 4-11。
- 王斐, 2020, 西方国家基础教育的外语教育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教育语言学研究》(2020): 115-122。
- 王寰, 2021, 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改革的政策演进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 王文斌、柳鑫淼, 2021, 关于我国外语教育研究与实践的若干问题, 《外语与外语教学》(1): 1-12。
- 王文斌、徐浩(主编), 2021, 《2020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肖华锋, 2022, 美国外语教育的历史考察,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154-165。
- 谢倩, 2011, 外语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 曾天山、荀莉、刘义国, 2021, 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精品教材的共同特征与建设重点——基于首届国家优秀教材奖的情况分析, 《课程·教材·教法》(10): 33-41。
- 张平, 2017, 海峡两岸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育政策比较, 《武陵学刊》(3): 126-132。
- 张天伟, 2021,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问题和思考, 《外语与外语教学》(1): 13-20+144。
- 张蔚磊, 2022, 外语教育政策研究: 理论基础与参考框架,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30(3): 55-60。
- 张贞爱, 2011, 外语教育政策与多维制约因素分析——以韩国外语教育60年改革与发展为例, 《中国外语》(4): 60-63+65。
- 张治国, 2018, 1949—2008年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内容及特点分析, 《语言规划学研究》(2): 44-51。
- 张治国, 2022, 全球治理视域下我国外语语种规划研究, 《外语教学》(4): 1-7。
- 赵耀, 2019, 中国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综述,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1): 108-115+120。
- 《中国外语教材发展报告》编写组, 2021, 《2020年中国外语教材发展报告》。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国外语教材发展报告》编写组，2022，《2021年中国外语教材发展报告》。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国外语教材发展报告》编写组，2023，《2022年中国外语教材发展报告》。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